



张謇： 一位状元的阔阔人生

□ 田耕 车耳

开栏的话

回望中国近现代史，许多有识之士
跻身实业，谋求国家经济振兴、民族独
立和社会进步，他们或成功或失败的经
历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。
正如毛泽东指出的，中国实业界有些人

是不能被忘记的，他们构成了近现代实
业家群体。从本期开始，本报开辟专栏
“近现代实业家小传”，来呈现这些兼
具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身份的实业家们
丰富的人生历程。

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士人们，通常梦想的是学而优则仕，“状元宰相”是这条路的巅峰状态。禀赋聪慧的张謇（1853—1926），坚持多年科考，终于在42岁时高中状元，大魁天下。然而，他并未踏上人们心目中的光明仕途，不久后就在给翰林院的辞职信中提到，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，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”，在国内风雨飘摇、列强虎视眈眈的背景中，毅然“下海”，将毕生精力用于实业、教育、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。张謇的人生道路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成长生态。他以独立智勇的开路先锋姿态，在近代史上留下一个豪迈悲壮的背影，引发人们的崇敬和探求。

轻工业不能忘张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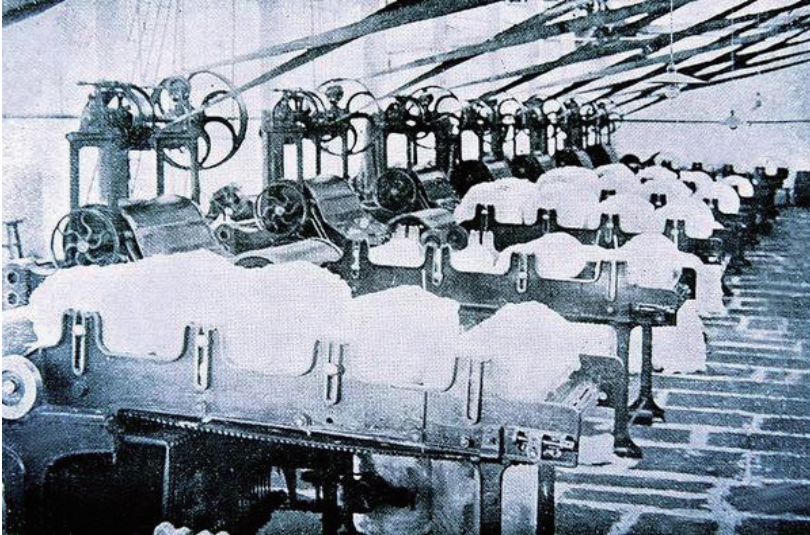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泽东评价道，说起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，可见张謇在近现代民族工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深远影响。

振兴实业责任须在士大夫。在我国历史书中，介绍张謇的标签主要是“近代实业家”。其实少时的张謇也憧憬过在宦海打拼，中状元后已授六品翰林院修撰。只是年过不惑的张謇早对清末朝廷的腐败没落深有感触，在上书弹劾李鸿章不成功，又受到《马关条约》卖国条款的刺激后，他发出了“几罄中国之膏血，国体之得失无论矣”的感慨。戏剧性的是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加快了他从状元到实业家的转折。

一日，他看到文武百官迎接移驾回宫的慈禧太后，那么多年迈的大臣们都跪伏在雨水中。平日他们或许都在万人之上，这时他们只在一人之下。衣服湿透了，马褂沾着泥浆，顶戴花翎滴着红水。而慈禧太后乘轿经过时都懒得看他们一眼，视若无物。帝王的权威如此之大，臣民的地位如此卑微。这场景让张謇对大清王朝官场心生倦意，顿悟“三十年科举之幻梦，于此了结”，遂义无反顾地离开，表示“中国须振兴实业，其责任须在士大夫”，希望通过发展工业强国富民，救国家于危难。于是在父亲去世返乡丁忧之时，张謇接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邀请，在通海一带总理商务，从此开启了他的实业之梦。

时存必成之心，时作可败之计。张謇把创业起点放在纱厂。棉纺织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，也是国外列强经济侵略的主攻领域。在那个时期，棉花是中国乃至世界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，美国、英国等西方国家对棉纺织业原料和制造的垄断优势持久而强大。而棉制品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当时主要短缺的商品，为进口商品之最。想要振兴国家，发展棉纺织业势在必行，于是他在南通开办了“大生纱厂”。

尽管状元及第的张謇拥有地利人和多种优势，集资招股还是出现了困难，让他举步维艰。张謇为此还常常跑到黄埔滩头对天长叹，甚至因为没有回家旅费放下身段当街卖字，饱受社会上的冷嘲热讽。然而，靠着坚韧的勇气和毅力，张謇坚持了下来。大



大生纱厂清花车间

生纱厂终于在世纪之交的1899年开车出纱，也为中国轻工业带来一个光明的开始。

张之洞任后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此向张謇祝贺时，想听听创业者的感悟。张謇回应说：“无他，时时存必成之心，处处作可败之计。”很多商人受到感召，追随着张謇，一起开拓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之路。

从纱厂到“大生帝国”。大生纱厂投产后效益不错，当年就获利超3万两白银，第二年更获纯利近12万两白银，之后也是张謇旗下利润较多的企业。

这种成功有几个因素。一是采取“赓续自转”和“滚雪球”的办法克服资金短缺问题。就是把已收购的棉花纺成纱，想办法快速销出，用回款购买棉花继续运转，尽量缩短生产销售周期，盘活资金链。这招背水一战的险棋，在当时却救了急。

二是利用了南通本地相对廉价的原料、劳动力和市场的便利条件。南通毕竟是小城，不像上海等地棉纺织业已被洋纱控制。且当地手工织布业对机纱的需求量较大，市场看好。在创建企业过程中，张謇发现当地有很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和手工业者，就大量招收入厂，其中还包括不少女工。这样不但帮助老乡解决了吃饭问题，也降低了用工成本。

三是施行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。张謇坚持股份制，资金募集时不忘融入现代企业管理方式，为此特意召开股东大会，选举董事局成员、查账员，完善企业治理体系。他还制定《厂约》，并赋予其现代企业管理的色彩。《厂约》的内容包罗万象。首先，明确管理者分工和职责，并把履职绩效与利润分红直接挂钩。其次，细致规定工作制度、考勤激励办法，让普通工人能依规践行。同时，张謇很关注工人福利，造了宿舍、医务点、公园、储蓄处等，把衣食住行都考虑到了，甚至有供子弟读书求知的学校。有了这些具备中西方先进管理理念的制度，再辅以张謇灵活的经营策略，使得这间大生纱厂逐步兴盛起来，也形成了向心力。工人们得到尊重，都视厂为家，干活儿的劲头也比较足。

从1901年到1907年，张謇以大

生纱厂为基础开始了行业扩张，最后形成著名的大生资本集团。“大生”的厂名，取自《易经》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意即天地间最大的美德就是孕育出生命，并且承载、维持着生命的延续。由此可知，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对商业经济利润的谋求，这个名称寄托着心系民生社稷的人生理想，他也通过毕生精力在追寻和实践着这个梦想。

立国由于人才 人才由于立学

张謇投身实业，但他的思想却依然在商向儒，提出“父教育而母实业”，希望以实业养教育，以教育促实业，二者迭相为用。在20世纪初，创业刚刚站稳脚跟，有了资金积累，他就开始积极筹划办学事宜。

江河浩荡的教育体系。在张謇的心目中，教育事业就像奔涌向前的大江大河，“师范启其基，小学导其源，中学正其流，专门别其派，大学会其归”。在创立南通师范后，他一发而不可收，仅在南通就创办300多所各类学校，为当地奠定了良好的教育基础。从教育梯度看，覆盖学前教育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；从教育门类看，有普通教育、职业技术教育、特种教育、社会教育等，非常全面，堪称江河浩荡。

教育与实业相结合。张謇的教育眼光独特，他非常重视实业教育，这包括中小学的农工科、各类职业技术学校，以及大专类院校等。他强调，实业教育目的是为实业和社会发展服务，就要与当地需要相配合。大生厂需要收购棉花，就创办农业学校；纺织需要专门人才，就创办纺织学校；百姓需要防治疾病，就创办医学专科学校。张謇主张职业学校要强化学习与实践相结合，特意建设农事试验场、森林事务所等试验示范基地，使学生真正掌握专业技能，也为社会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。

守家国之心 增社会福祉

在教育和实业都有所进展后，张謇又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慈善及公益领

域。“举事先必智，启民智必先教育，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，乃先实业。实业、教育既相资有成，乃及慈善，乃及公益”，他一步步地在南通实践地方自治理想，不断改善当地社会治理和服务水平，提升民众生活福祉。

自己安乐，便想人家困苦。张謇少时痛恨有些富人的嚣张气焰，立志非要有钱不可，而且发誓有钱后不做守财奴，一定要全部用在有益的事情上。他用心做慈善或许根源于此。张謇明确表示，有人做慈善是积阴功或图虚名，自己真没这些想法，“不过自己安乐，便想人家困苦，虽个人力量有限，不能普济，然救得一人，总觉心安一点”。他的慈善事业可以说关怀遍及老弱妇孺及鳏寡孤独残疾者。20世纪初，张謇迁址新建南通育婴堂，受到社会欢迎。由于送来的孩子太多，张謇向社会募捐，为“新育婴堂建楼十七幢，以广育婴之额”。育婴堂开办前8年就先后收养上万名弃婴。张謇和其兄张謇都从育婴堂认养过男婴，并以亲子育之。

在他60岁生日时，有不少亲朋好友打算携重礼庆贺。张謇公布“移生日宴客费并馈金建养老院启”。他的想法得到大家支持，当年就建立了南通第一养老院。随后张謇还兴建了医院、济良所、义堂、贫民工场、残废院、栖流所等。这些慈善机构满足了社会需求，挽救了特殊人群的生命，有些还兼有教育作用，帮助人们依靠自身能力立足社会。

超前的文化自觉。张謇认为好的社会环境需要有浓厚的文化气息，可以潜移默化地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和修养，因而倡导兴办了不少文化事业。他自筹经费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和较早的近代图书馆。此外，张謇还兴建了印书馆、气象台、公共体育场、剧院。这些文化场馆或企业，都是开拓性的，体现出一位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及责任担当，也在启迪民智和提升百姓文化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美好的社会治理图景。沿着自治思路，张謇不断拓展事业，涉足到交通、水利、城市规划等基础建设，绘制出一幅美好的社会图景。从测绘当地舆图开始，张謇精心安排城市各项基础建设。家人提到福特公司老总说“有了汽车，自然会造路”，张謇则说，“这是汽车老板的话，我以为一定要先有路，然后才想去买汽车”。张謇在南通设计建造全县通行的主干、支线道路，当地百姓很支持，占用田地时都不收钱，而且积极参与道路建设。张謇非常欣慰，认为是多年推进自治的良好结果。在他的规划建设下，南通形成一城三镇格局，老城区是综合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生活中心，唐闸、天生港和狼山镇分别是工业、港口和风景名胜景区，组合成自然和谐的美好生态画面。

张謇一生开拓无数道路。去世前，他还带病现场察看长江保坍工程，为事业鞠躬尽瘁。他把毕生所得都投入到教育、慈善、社会公益上，只希望“遗留一二有用事业”，不与草木同腐。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，张謇多样化的建树和探索令人震撼，他的家国情怀拓展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品格气度。百年后的今天，张謇依然值得我们追慕和学习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，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。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时，中华民族各种力量奋起自救，社会上各种思潮不断涌现，都力图挽救民族危亡。但是，由于自身的局限，它们均未能完成历史使命。十月革命后，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，才使得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。纵观历史与现实，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。

各种政治力量无法 挽救民族危亡

晚清时期，在清政府认识到自己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后，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欲通过与先进国家交往，促进自己的发展。此后，清政府内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。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、文祥等满族宗室贵族官员为代表，在地方以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汉族官员为代表，他们主张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展壮大国家。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颓败，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，它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，但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。在洋务运动消弭后，清政府内维新派兴起，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推动光绪帝进行改良，其标志性事件是戊戌变法。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，由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，提倡科学，改革政治、教育制度，发展农工商等。这些主张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抵制。1898年9月21日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光绪帝被囚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逃往国外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，变法失败。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，也是具有图强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，它为辛亥革命爆发打下了思想基础。

面对民族危亡，19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场以“扶清灭洋”为目标的农民运动，这就是义和团运动。为镇压义和团运动，日、俄、英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发起侵华战争。1900年春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，义和团运动失败。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，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。在清王朝多年的挣扎残喘后，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。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是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，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。

各种思潮学说无法 指明国家发展方向

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，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、互为影响。虽然这些思想主张各有特色，但是都无法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提供思想引领。即使如此，这些思潮还是拓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，促使他们在比较借鉴中，更加坚定了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决心。

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，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代表在早期影响最大。它由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。民族主义，即反对满清专制和列强的侵略，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军阀，求得国内各民族平等，承认民族自决权；民权主义，即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的弊端，核心是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，即政府拥有治权，人民则拥有政权；民生主义，最重要的原则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。在三民主义指导下，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但并未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，这证明三民主义主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，合作主义、泛劳动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互助论等竞相传播。其中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互助论影响较大。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，20世纪初出现在英国，主要代表有潘蒂、霍布森等。这一派别认为只要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基尔特（工人自治组织），实行产业民主和自治，基尔特和国家合作负责产品分配，就可以消除一切压迫，实现社会主义。实质上这是行会思想同工团主义的混合物。在当时的中国，它还是有一些追随者，但在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流派的论战中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。互助论也是当时流传较广的社会主义流派，创立者是俄国的克鲁泡

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

□ 孟鑫

特金。他认为，人类依靠互助本能，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，实现正义、平等、自由等目标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。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，但却混淆了阶级界限，反对阶级斗争，主张社会改良。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恽代英、毛泽东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，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，这些中国先进分子逐渐抛弃了这一主张。

无政府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传播较广，20世纪初从欧洲传入，与中国古代的“大同”“均平”等思想相融合，形成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。它反对专制制度，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；主张绝对自由，反对建立政党和组织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论战，陈独秀和李达均对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了深入剖析，揭露了它分裂工人运动的实质。此后，无政府主义思潮逐渐衰落。

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

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、在苦闷中探求之际，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十月革命给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。客观上，俄国与当时的中国国情上有较多相似之处，如经济文化落后、封建压迫严重等，这使得十月革命的道路对中国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。同时，俄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，这使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先进分子更加向往社会主义。主观上，当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多种尝试、各种主义均无法挽救中国后，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，选择马克思主义，“走俄国人的路”就成为共识。毛泽东听闻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，在给好友蔡和森、萧子升的信中写道：“我看俄国式的革命，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。”

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，明确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。它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获得解放的历史条件，明确了历史使命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获得自由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，找到了一条使中国走向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正确革命道路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，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。历史证明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。



张謇时代的南通街头和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

近现代
实业家
小传

社会主义
从哪里来